



毛泽东诗词与传统文化

□ 汪建新

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诗词不过几十首，但思想深刻、意境高远、博大精深。究其原因，毛泽东诗词不仅高度浓缩了毛泽东的人生追求、伟大实践和深邃思想，而且也艺术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丰富多样和勃勃生机。解读毛泽东诗词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不仅有助于领略毛泽东诗词的厚重底蕴，也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和文化贡献。

学习：绿杨树下养精神

毛泽东曾把求学经历描述为“六年孔夫子，七年洋学堂”，但他从未间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研究。他从8岁进私塾求学开始，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地读书，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毛泽东一生题词无数，但写得最多的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这七个字。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他都以书为伴，博览群书，近乎痴迷。后来他居住的中南海丰泽园藏书达9万多册之多。在众多书籍中，他最偏爱文史古籍，从先秦到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史作，包括正史类、碑史类、演义类、文学类……几乎无所不读，全而盖之。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他24年不离身边，反复研读。一部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他竟看了17遍之多，堪称是博览古今的大学问家。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更是情有独钟，涉猎的诗词作品遍及历朝历代。他既读各种总集、合集、选集、专集，也读各种诗话、词话、音韵、词律。从诗的内容看，叙事、记怀、抒情、写景、咏史、怀古的他都读。从诗体看，古乐府、律诗、绝句、

词、曲、赋都一并涵盖，可谓是博览广收，兼采众家之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广，对古典诗词烂熟于心，在文章、报告、书信、谈话、题词中，为说明观点、论证事理、表达感情，他能够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出口成章，处处彰显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卓越的诗人才华。

继承：东临碣石有遗篇

中国古典诗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独特地位，是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是流传最久远最普及的文学体裁。毛泽东曾说，“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然而，他本人对旧体诗词却乐此不疲，“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

毛泽东全面继承了古典诗词的民族风格与中国特色。他的诗词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既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还有七绝杂言诗。他更擅长填词，运用了20多种词牌形式，如沁园春、贺新郎、菩萨蛮、念奴娇、蝶恋花等。他深谙诗词写作规范，语言精当、对仗工整、结构严谨、韵味无穷。他经常巧妙引用、借用、化用古诗词中的名言佳句。在毛泽东诗词中，从文化名人、历史典故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几乎无处不在。

在思想内容方面，毛泽东诗词继承了古典诗词源于《尚书·尧典》“诗言志”的优良传统，在价值取向上吸收了儒家文化以“仁学”和民本思想为基础的经世致用的政治理念，始终突现一个伟大革命家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和不懈追求。毛泽东诗词直抒胸

臆，饱含“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忧患意识，充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富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顽强意志，强调“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政治抱负，满怀“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理想，推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积极态度，秉持“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的豁达心态。

而在表现手法方面，毛泽东诗词更多地受到以道家理念为源头的讲意境、重气韵，强调个性自由和浪漫情趣等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诗词继承了庄子、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文采飞扬、热情奔放、纵横捭阖，不管是写自然景观、写动物姿态、还是写社会实践，都充分表现出宏大气魄和洒脱之气，深刻揭示出事物和人物的内在本质，折射出美学和哲理的绚丽光芒。

批判：倒海翻江卷巨澜

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是，他特别信奉孟子的说法：“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从来不盲目迷信传统文化中的所有内容。早在少年时代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时，毛泽东发现这些书中讲的都是文官武将，一味地颂扬帝王将相，从来没有人去正面塑造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形象。毛泽东的批判性思维促使他开始认真反思究竟谁是国家和民族的真正主人这一重大历史命题，他最终成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那些消极因素的叛逆者。这一政治立场既展示出毛泽东诗词内容与传统文化相反相成的渊

源关系，又表现出毛泽东反叛传统、超越传统的宏大气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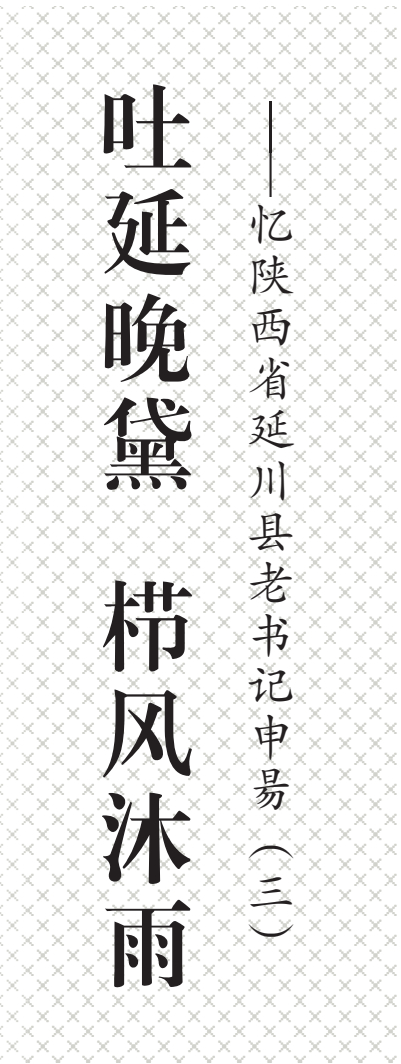
柳亚子曾盛赞毛泽东诗词是“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贺新郎·读史》纵论中国历史，是毛泽东唯物史观的诗意表达。“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不免使人想起鲁迅《狂人日记》中的那句话：“满本子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是对英雄史观的大胆嘲讽和彻底批判。“盗跖庄屨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毛泽东充分肯定“奴隶”“卑贱者”的历史地位，称赞他们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风流人物”。他在注释《沁园春·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明确说明“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毛泽东以史无前例的如椽大笔和盖世豪情塑造人民群众的群体形象，热情讴歌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社会实践。

革新：战地黄花分外香

古人很早就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推陈出新”是毛泽东1942年为延安评剧院所作的题词。他推崇古为今用，但认为这个“用”并不是简单照搬，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诗人共折腰”，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意境，从题材到风格，对传统诗词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与创新，使其既富有革命性又充满艺术性，极具民族个性又饱含时代精神。正如郭沫若所说：“主席的诗不能说是旧的，不能从形式上看新旧，而应从内容、思想、感情、语汇上来判断新旧。”毛泽东诗词评史则对历史有新看法，论人则对人物有新

见识，写物则对物象有新寓意，记事则对事情有新视角，是传统艺术形式现代化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学古而不泥于古，立足传统又突破传统。1954年夏，毛泽东挥笔填写了大气磅礴的《浪淘沙·北戴河》。谈及这首词的创作缘由时，他说：“李煜写的《浪淘沙》都属于缠绵婉约一类，我就以这个词牌反其道行之，写了一首奔放豪迈的，也算是对古代诗坛靡弱之风的抨击吧。”历代咏梅诗作不计其数，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的绝妙佳作。陆游词中的



□ 黑荫贵

与书记论短长

在我们插队的第三年，北京支边干部来到了有北京知青的大队。他们是总理安排来延安的，延安也成了全国唯一派干部管理的知青点儿。北京干部的到来，确实为知青在陕北插队解决了建房和集体办灶以及招工招生的大事，县上对北京干部也是十分重用，有的成了县委常委，同时也让他们参与全县的农业和农村工作。

那时整顿基层领导班子是全县的



重点任务，于是县上抽调了大批干部、教师，又抽选了一批北京知青。北京干部大部分投入到工作队中，我和北京干部茅雀鸣、郝健等分配到关家庄大队进行整顿工作。

关家庄大队在离公社十里的上川，是一个有着上千口人的大村，是全省有名的大队核算的生产大队。村里山平地缓，可耕种土地是公社最好的，又有条件优越的两条大沟，自然条件好。可是多少年来，穷困使整个村子死气沉沉，地不长粮、人心涣散，形成了有名的懒人村、烂杆队。

进村不久，我们工作队觉得这个问题就出在村的核算体制上，本来不大的队，还分为四个小队，一共200多劳力。所有的劳作和分配统一由大队控制，可劳作又是分散在四个小队，人们干起活来，都看着别的队怎么干，比的是少干不干，生怕吃亏，而分配时是四队均分，哪个队收成好，干得好也是多分不了一升口

粮。周围的队都是小队核算，只有关家庄因为是省上树起的样板队，没有人敢变动大队核算，全队人一直为此事向上反映，都没有结果，年复一年人们守着优越的条件，却无法摆脱贫困，所以就只能混日子。

为此事我们工作组内部也是争论不休，我们北京来的三个人，就觉得应该化小核算单位，但当地的两个干部却坚持不能动，动静太大难办。好在当时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中也有了“适当化小核算单位”这样的提法，于是我就写信给有关领导，说明关家庄大队应化小核算单位，改大队核算为四个生产小队核算的建议。

可是没有想到，这一建议立刻遭到了公社领导、县上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反对，有人说这是“拔红旗”“是拆人民公社的台”。县上还专门派人来调查我和两个北京干部，想知道这是谁指使的。

申书记也来了，他专门把我叫到

一处，劈头就问：“到底有没有上边人指使”。此时的我一时着急，竟然说“有”。申书记严厉地说：“荫贵咱们别上了他人的当啊，这可是大是大非啊！”我说：“不管有没有，您让我全面汇报一下好吗？”一段长达一个小时的汇报，申书记认真地听，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他的思索，他对我汇报的内容有认可，可是从他沉重的脸上我仍看不到有改变的样子。我说：“书记，适当划小核算单位的提法，就是一个松口的办法，关家庄大队多少年因核算问题没有了积极性，划小了干活一定会不一样的，这跟‘拔红旗’根本是两码事。”申书记听了反而态度更严肃了，他说：“不许改，你们要听县上的。我们回去研究，可千万别在这儿犯错误，否则就是害了你，知道嘛。”申书记狠狠地指了我，转身走了。

借着要到县上开会，我们偷偷告诉生产队干部，你们分吧，拿个方案出来。等我们开会回来，关家庄已把队分了，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消息传到县上，申书记专门派人把我叫到县上，在办公室里，他对我说：“小黑呀，你胆子太大了，这事已经让地委知道了，他们来电话叫我制止，你犯了大错误。”我当时也傻了，但仍坚持，嘴硬地说：“我没错，跟‘拔红旗’无关”。此时申书记却平静下来，告诉我：你不要回关家庄了，到齐家疙瘩整队去。我说：那拆队的事情怎么办，申书记说：我来处理。

没有几日，当我到公社时，我才知道关家庄化小核算单位的事成了，无人表态，也无人追究，事情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后来申书记跟我说：“后生年轻啊，那事我们也是同意的，但又怕你受牵连，所以我就跟地区讲，是我搞的试点，收放在县委一句话。”关家庄躲过了一场政治风波，老书记处理问题的方式让我敬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何以保全就智慧，申书记的智慧让关家庄人得到了自己的权益，保全了基层干部。

申书记送我回关庄包队

与贫下中农结合的日子里，一个让我们最困惑的问题就是广种薄收——缺肥少水，粮食产量低，人均每年只有不足200斤的口粮，但仍要承担公购粮的繁重任务，大约公粮人均50斤，购粮人均80斤。这样一年到头的收成就是一场国家公粮的必保，人口粮半年的无法接济，干部围着征收转，百姓围着一家人吃喝愁。加上那些年陕北干旱，无霜期短，所以人们为种粮，为多产粮，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边是必须完成的收购任务，一边是无力的疲于应付，整个陕北已经出现了弃家讨饭，人被饿死的情况。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领导人来到延安，视察期间，总理目睹了老区人民的现实生活，他落了泪，说出了“对不起老区人民”的话，并召开了座谈会，向陕北提出了中央一定帮助延安度过当前困难，作出了延安地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指示。紧接着支援延安的解放军送粮队开来了，延川迎来了直升机送来的救济粮，一时间整个陕北人心大振。

那时我已成为延川正式干部，在拓家川公社当团委书记。当我在县上听传达时，延川县团委的焦玉海第一个站出来要求不要工资，返乡包队实现三变五翻，紧接着许多干部也提出申请。那时我想如果再回到关庄大队，按照周总理指示大干一场，关庄村的面貌一定会改变。于是向申书记送去了申请书。申书记立即召开全县干部大会，让我在会上发言，讲自己的想法，同时他在大会上说：“北京知青都站出来，我们延川人还能坐等嘛！”他号召所有干部都要下去，包一个队，下死决心，实现周总理的嘱托。会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叮嘱去了一定不要心急，要从基本农田入手。又说不能放弃公职和工资。我给你保存下来，代职包队。这样才是最稳妥的方式。他送我回到原属队的关

梅花在凄风苦雨中遗世独立、孤寂冷漠、消极退缩、凄凉愁苦。毛泽东则盛赞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一“俏”一“笑”令人耳目一新，反出了骨力遒劲、伟岸飘逸的艺术神韵。《采桑子·重阳》是咏秋之作，“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毛泽东一扫“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悲秋情结，称颂战地黄花的馥郁芳香，赞美秋日风光的苍劲寥廓。《孙子兵法》主张“穷寇勿追，”而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毛泽东为了中国人民的长治久安，反其意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泽东对古典诗词革故鼎新，创作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郁中国气派的不朽诗篇，形成了中国悠久诗史上风格殊绝的新形态的诗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和艺术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同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